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教育史

主编 姜树卿 单雪丽

黑 龙 江 教 育 史

主 编 姜树卿 单雪丽
常务副主编 崔多立 王贵福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龙江教育史/姜树卿 单雪丽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6

ISBN 7-207-05545-5

I . 黑… II . 姜… III . 教育史—黑龙江省

IV . G52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1666 号

责任编辑:魏杰恒

装帧设计:《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总课题组

黑龙江教育史

主编 姜树卿 单雪丽

出版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c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省教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37 $\frac{12}{16}$

字 数 860 000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545-5/K·674

定价:9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编委会

(均以姓氏笔画为序)

名誉顾问	何东昌	邹时炎	杨海波	徐锡安	陶西平
顾 问	王日新	王炳照	田正平	江 铭	郭福昌
	黄定元	阎国华	潘懋元		
主 编	周玉良				
副主任	汤世雄	宋恩荣			
编 委	王豫生	方 骏	冯象钦	齐红深	刘文璞
	安效珍	李才栋	李定开	杨进发	张凤民
	张 彬	陈乃林	陈光华	金汉杰	赵关忠
	赵宝琪	俞启定	姜树卿	高 志	徐毅鹏
	符康荣	傅九大	蒙荫昭	蔡寿福	熊贤君

《黑龙江教育史》

编纂委员会

主任 董 浩

副主任 卢振环 张永洲 王普庆 孟凡杰 辛宝忠

赵 敏 康宝林 孙万良 高 喆 姜树卿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贵福 尹晓兰 田 东 孙 权 李 平

任铭越 刘雪松 李高贵 吴 涛 张连玉

张志强 张春堂 汪润珊 孟广智 牧 童

郑吉南 单雪丽 娄 眇 赵义强 姚洪滨

秦成方 阎滨春 焦光宇 韩基库

咨询委员会

主任 张守中 张慧芳

副主任 陈龙俊 童明英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司玉璞 刘 桓 李兴盛 李家宝 孟广耀

孟昭庶 张泰湘 郑欣春 谢 岚 薛自元

鞠颖哲 魏国宗

主 编 姜树卿 单雪丽
常务副主编 崔多立 王贵福
副 主 编 徐光宗 吕增富 毕德来 张德旺
谢景芳

编写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敏	王贵福	毕德来	李玉杰
吕增富	刘惠林	曲阜文	张德旺
周喜锋	单雪丽	赵 滨	姜树卿
徐光宗	崔多立	隋丽娟	谢景芳
薛德文			

总序

在这世纪更迭,千年转换的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奉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项目。本项目研究是由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牵头,在中央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支持下进行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统一规划,按行政区划组织力量开展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关于地方教育史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开展,是中国教育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发展、兴盛的历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清除极左思潮干扰,端正学科研究方向,系统搜集整理积累资料,拓宽研究领域,深入开展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使中国教育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教育科学领域里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门学科。

从以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关于古代教育史的描述,多为汉族聚居,文化发达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历代居于政治中心地带的教育状况。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则较为注重京、沪、宁与东南一带新教育产生的地区。这种侧重,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因为这些地区一般来说代表了当时全国教育发展的水平与主流。但是,过去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忽视了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各民族教育交流融合的历史,因此还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如实地反映整个中国教育史的全貌。开展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延伸与加强。而不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简单诠释或地区性缩微,应有新的发掘,新的创造。研究地方教育史,需对中国教育史的总体发展脉络有宏观上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各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和历史特点、地域特色。其研究的对象、范畴与方法,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它既要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性,更要揭示地方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与个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特色是地方教育史的生命。紧紧抓住“地方”二字是这一研究的关键。

地方教育史是研究教育现象的空间与时间组合的学问。从广义上讲,它应归属于“地域文化”的研究范畴,是介于教育学与地理学、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研究地方教育史,自然会涉及到各地教育发生、发展与本地区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而对人们教育的模式、程度、内容与方法等,对民俗、民风,对人的气质、性格、品味、情趣的形成以及人才的数量与分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于这些,我国的古籍中早有所记载。自然环境同时也影响着一方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民居建筑,这些又都是教育的外部条件,间接地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至于人文环境、社会结构对教育的影响,应当说更为直接,更为广泛。诸如区域历史文化变迁中经济的升沉消长,政治的争斗沿革,文化的滋生变异,民族的纷争融合,人口的增减流动,战争的起伏动荡等等,可以成为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制约条件,影响着教育的方针、内容与方法。同时学派与学术思想的地域性分布,更是直接作用于教育。如北宋、南宋时期的关学、洛学、濂学、闽学、婺学、陆学、湖湘学等都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这些学派的相对集中与士人设学授徒传播教化,直接影响着当地的教育走向及其特点。

地方教育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地域文化

的区域划分,可分为“机能文化区”与“形式文化区”。前者以行政区划中心的主导与协调功能为标志。后者以“具有某种文化特征或某种特殊人群的地域分布”,以历史文化功能为标志。从历史的视角看,以上两种空间的组合各成体系。对于一些地区来说,两种文化区的划分、归属互不对应,而在另一些地区,则又呈现为长期稳定的重合。

根据对各省区发现的7 000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其后种种历史资料的考察,可以证明在公元前6000至前2000年间的文明曙光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分散聚居的各个地区,已分别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多元性区域文化。如以渭、汾、洛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文化区,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文化区,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化区,以及辽东、辽西、燕山地区的燕辽文化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的华南文化区,黄河上游的甘青文化区,北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等等。而且这些不同区域文化在漫长历史演进中或迁播扩大,或分化重组,又演变成新的文化区域。如后来的三秦文化区、齐鲁文化区、中州文化区、荆楚文化区、三晋文化区、燕赵文化区、关东文化区、吴越文化区、徽州文化区、巴蜀文化区、滇云文化区、黔贵文化区、八桂文化区、八闽文化区、岭南文化区、陇右文化区、草原文化区等等。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间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地相互摩擦、交流、渗透、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总格局。这种种演变又直接影响到相互间的交通、人口迁徙,逐渐形成了长期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我们现在讨论的地方教育史,是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范围的。今天的行政区划是由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与相对稳定的文化系统演变而成。虽不完全对应于古代的历史文化区域,但文化的承袭与曾经所属的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追寻地方教育的历史轨迹所不能忽视的。

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避难、军队戍边、政治变乱、自然灾荒等

种种原因,曾经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和民族迁徙。这些都对文化的交流重组,教育的兴衰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例如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游牧民族入据中原,先后形成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大批中原人民的南迁,在给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与中原文化。除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外,还有历代因罪而被贬谪的官员士人的零星流放迁移。他们中有许多谙习儒家经典的人才,南来之后无论著书立说,还是教学授徒,都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教育与文化习俗。如东汉末年,会稽大儒虞翻因直言获罪,被贬交州(含今广东、广西)。但他“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又如柳宗元“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又迁为柳州刺史。他雄心不减,兴建州学与孔庙,重振文教事业,不仅对湖南教育、广西教育,而且对其他地区的教育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近代来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迫使中国教育大规模西迁。使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蒙受了巨大的破坏,延缓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从另一方面讲,众多文化精英在短期内迅速地向西南地区、西北地区聚集,形成了战时内地文化教育中心。既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新思想、丰厚的人文精神充盈到这块偏僻的土地,又为战后教育与文化的复兴保存了民族的命脉。这些在抗战时期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的教育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为指导,在近年来地方志、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掘地方教育史的资料,对各地教育发展的历史加以科学地梳理与分析,实事求是地记述地方教育发展的史实,客观地分析与总结其特点与规律。通过研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教育发展的丰富而多样的全貌。通过这一研究,为当前的教育改革与未来的教育发展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

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多年来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以“地方教育”为研究对象，既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还需揭示历史本质，分析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评论利弊得失，作出价值判断。与地方教育志研究相比，地方教育史研究更多地体现出研究者的主体性因素。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更加坚定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实证史学的方法，注重证据实证，重视逻辑，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并要不断地加强对新知识新方法的学习、借鉴与运用。只有这样，才可能追随学术的前沿，阐发历史的精义，提供历史的借鉴。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世纪转换与千年过渡时期立项、开题、研究、完成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试图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出时代的精神。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代历史学的研究，都会深深地刻上时代的印记。历史科学的认识过程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时代精神都会在历史认识的观点、视野、视角、方法等方面得到及时的敏锐的反映。经历了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史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做出了一些新的澄清，新的结论，新的认识，新的评判。过去那种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已得到很大改观，那种以“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卖国”等简单化、表层化的评判方式，那种以政治标准代替学术标准的治学模式，已逐渐被人们舍弃。当新的史料不断被发现，日渐丰富充实，当中国越来越快地、越来越大幅度地走入世界，社会环境与社会心理都日渐发生变化，当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胸襟，去开拓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用更为客观、冷静、开放、包容的态度，更加高屋建瓴地来审视过往的历史。我们紧紧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努力在地方教育史的原野上开辟出一片片新的绿洲，结出累累果实。我们相信，通过展现地方

教育史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全貌与总体的认识。同时,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者的论调,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开展,可能会对人们认识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一些新的思考与借鉴。

一部部各具地方特色的教育史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版,为整个中国教育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使我们认识到,忽视对地方教育史的研究,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的记述与教育发展规律的总结是不完备的。中华民族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统一整体。这个统一的整体,正是通过各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地方教育,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以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为参照系探寻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与不平衡性,通过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不平衡性来进一步研究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二者间的相互比较与印证,将有助于更加科学、全面、深入、准确地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经验教训,更好地发展符合国情、省情、区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中华民族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教育曾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全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切切实实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有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有助于造就一代新人,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更加有力地推动 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总课题组

绪 论

—

黑龙江省位于祖国东北边陲,总面积 45.4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4.7%,居全国第六位。全省总人口为 3 792 万,共有 48 个民族。

黑龙江省由本省最大河流黑龙江得名。它的东端在抚远以东、乌苏里江流入黑龙江的交汇处(东经 135°05'),西端至兴安岭北部的大林河源头以西(东经 121°11'),北起漠河以北的黑龙江主航道(北纬 53°33'),南至东宁的南端(北纬 43°25')。东西长 930 公里,南北相距 1 120 公里。黑龙江省北部和东部隔黑龙江、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与俄罗斯的水、陆边界长达 3 045 公里。西部与内蒙古自治区相邻,南部与吉林省接壤。

黑龙江地区迄今已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距今最早的 17.5 万年。它们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在黑龙江地区生存繁衍。

黑龙江建置始于汉代。唐代黑龙江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中央王朝在此设立地方行政机构都督府,册封都督。自此,历代王朝均委派官吏,对黑龙江地区行使控制、管辖之权。清初置黑龙江将军衙门,为以“黑龙江”命名地方权力机构之始。清末置黑龙江行省,为黑龙江地区设省之始。

公元 17 世纪中叶,沙俄势力不断侵入黑龙江流域,受到了黑龙江地区军民的顽强抵抗。1689 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肯定了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至海、外兴安岭以南的整个黑龙江流域(包括库页岛)的广大地区,完全属于中国领土。19世纪中叶,沙俄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霸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华民国前期,军阀混战,派系之争不断,黑龙江地方政权机构亦动荡不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黑龙江地区,伪满洲国先后在黑龙江地区设立了龙江、滨江、三江、黑河、牡丹江、东安、北安等伪省政权机构,统治该地区长达14年之久。

解放后,从1945年底开始,在黑龙江地区,先后建立了松江、黑龙江、嫩江、合江、绥宁、牡丹江等省和哈尔滨市民主政府。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合并为黑龙江、松江两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黑龙江地区仍设黑龙江、松江两个省,1954年8月1日,两省合并,称黑龙江省,省人民政府设在哈尔滨市。

黑龙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的神圣领土,黑龙江各族人民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各族人民进行的教育活动和开创的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史上谱写了独具特色的篇章。在《黑龙江教育史》编纂过程中,坚持和突出了以下指导思想、编写原则和地方特色: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科学、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史论结合,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较深入、系统地研究黑龙江地区有史以来教育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进而,寻找各个历史时段的教育特点,探索黑龙江教育发展规律,总结经验与教训,力求使《黑龙江教育史》成为一部具有地域特色和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为黑龙江省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历史借鉴。

第二,多年来,黑龙江省教育史研究领域曾开发出许多科研成果,成为黑龙江教育史研究的宝贵财富。但这些成果基本都是断代史、分类史和年鉴。而《黑龙江教育史》却是第一部反映黑龙江有史以来教育发展的通史。上限突破了黑龙江最早的学校教育现象出现在公元 700 多年前的隋唐时期渤海国的已有史料记载,从研究黑龙江的文化现象入手,力求从黑龙江古代先民原始的生产劳动教育和社会生活教育中,挖掘出黑龙江早期的教育现象和学校教育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原因,从而将黑龙江地区教育的历史上溯到了 17.5 万多年前有人类活动的时期。关于下限,过去已有的资料只记叙至 1985 年。当代的一些教育现象正在进行之中,有些做法正在研究实验当中,尚无结论,难以评述。所以许多史学工作者主张“隔代修史”。但写“当代”教育史虽然难度大、风险大,其成果的社会效益、存史价值和对现实教育工作的指导意义也会更大。故《黑龙江教育史》把下限定在了 2000 年末。对于当代的一些教育现象,能论的则论,难以下结论的就客观地记述事实,留下翔实的资料,让后人去评论。

第三,黑龙江是个多民族地区,古代黑龙江地区的教育具有很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教育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丰富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黑龙江教育史》客观地记述了古代黑龙江地区教育的多民族特色。诸如对于渤海国是唐朝时期黑龙江地区以粟末靺鞨为主体的地方民族政权,在存国的 228 年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儒学教育制度,渤海教育是黑龙江学校教育的起源,它标志着中原儒学教育在黑龙江地区的开始和实施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契丹文、女真文、蒙文、满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教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对于古代少数民族统治集团兴办的学校教育都强调军事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满族八旗的“满语骑射”教育更具特色;对于在黑龙江阿什河流域建立金国的女真教育以学校教育为主,设女真学,实行科举,创造出一系

列适合本民族发展的教育形式和内容,对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共同文化,促进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等都作了系统地叙述。清朝前中期的流人办学也是黑龙江古代教育的一大特色。清初开始,政府把“罪犯”及反清起义者迁徙、发配到黑龙江等边疆地区,这些人被称为“流人”。为了生计,在黑龙江的一些有文化的流人设私学教徒,或受聘做家庭教师。他们成了黑龙江地区私学教育的传播者,为改变黑龙江教育的落后状态作出了贡献。对此,我们也给予了肯定。

第四,近代黑龙江教育的特点:一是 1861 年清政府对东北开禁,黑龙江开始建立新式学堂。特别是黑龙江地区设行省后,教育管理体系逐渐得以完善。二是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对黑龙江民众实施殖民地奴化教育与人民群众开展了反对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斗争。19 世纪中叶,沙俄的传教士进入黑龙江,开办各式教会学校。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黑龙江实施了长达 14 年的殖民地奴化教育。教育界开展的反对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斗争和抗日救亡斗争在黑龙江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三是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作为全国解放的后方根据地,率先对旧教育进行改造,并提出“正规化办学”的方针,为建立新中国的教育体系提供了经验。通过积极开展干部教育,为后方建设和全国解放输送了大批干部。

第五,当代黑龙江教育的特点: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黑龙江首先创办新型正规化学校,学习苏联经验,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学校管理,使新中国教育模式的雏形在黑龙江基本形成,为全国提供了先进的办学经验。当然,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左”的和形式主义的倾向。二是成人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建国初期的“冬学”(利用冬闲开展的教育)和 20 世纪 50 年代的扫盲运动,为全国成人教育提供了先进经验。三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黑龙江省被确定为国家的重要工业基地,大批重点工程在省内兴建,促进全省大力发展了职业技术教育。四是改革开放

时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师资队伍建设等经验在全国颇具影响。讷河市、桦川县、密山市、呼兰县等地进行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全省的中小学规范化建设、残疾儿童跟班就读等经验,为全国的教育教学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

黑龙江是一个由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回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等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地区。考古研究证明,早在 17.5 万年以前,黑龙江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踪迹。由于人类活动的出现,黑龙江地区的教育也随之产生。人类在生活和生产劳动中,长辈向下一代传授劳动技能、生活经验、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尽管这些活动并没有文字记载,但这却是原始教育活动的基本内容,是黑龙江地区的远古人类为我们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存。

从旧石器时代经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黑龙江地区的古代先民经历了原始社会的原始人群和氏族发展到氏族部落阶段。到了商周时期,黑龙江地区已经形成了东部的肃慎族、中部的秽貊族、西部的东胡族等三大民族。但由于各民族分布地域不同和原始教育内容不同,因而文化特征不同,各具其鲜明的特色。距今 4 000 多年前,居住在黑龙江地区的三大古老民族与中原王朝和国内各民族人民建立了联系,进一步促进了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也为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唐朝时期是黑龙江地区古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学校教育的出现和发展。渤海国是唐朝的地方民族政权,是唐朝中央政权统辖下的一个州。渤海国建立后,便开始全面推行唐化政策,一方面派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儒家文化,另一方面仿照唐朝教育模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儒学教育制度。在京城设